

大陸學者叢書 7

宋如珊·主編

五四時期的

翻譯文學

張中良／著

本書對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既有宏觀把握，
也有微觀透視，呈現出歷史原生態，
梳理出翻譯文學由近代跨進現代的發

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

張中良

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張中良著．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05 〔民 94〕

面：公分． -- （大陸學者叢書；CG0007）

參考書目：面

ISBN 986-7263-54-5（平裝）

1. 翻譯－中國－歷史

811.709

94013502

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

作 者 / 張中良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主編 / 宋如珊

執行編輯 / 李坤城

圖文排版 / 郭雅雯

封面設計 / 莊芯媚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銷售發行 / 林怡君

網路服務 / 林孝騰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ISBN-13 / 978-986-7263-54-4

ISBN-10 / 986-7263-54-5

2006 年 7 月 BOD 再刷

定價：42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6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總 序

1992 年，兩岸開放探親後的第五年，我在埋首撰寫論文〈大陸的台灣文學研究概況〉過程中，驚覺對岸對於台灣文學研究的投入成果，並在種種因緣之下，開始關注對岸文學，一頭栽進大陸文學的研究與教學。

多年來，心中一直記掛著應該把台灣的大陸文學研究情況也整理出來。因為台灣和大陸是現代華文文學研究的兩大陣地，除了兩岸學界的本土文學研究之外，還須對照兩岸學界的彼岸文學研究，才能較完整地勾勒現代華文文學研究的樣貌。去年，我終於把這個想法，部分地呈現在〈台灣的「大陸當代文學研究」觀察〉一文中。但是，這個念頭的萌發到落實，竟已倏忽十年，而在這期間，仍有許多想做和該做的事，尚未完成，不禁令人感慨韶光的飛逝和個人力量的局限。

回顧過去半世紀以來的現代華文文學研究，兩岸都因政治環境和社會文化的變遷，日益開放多元；近年更因大量研究者的投入，產生豐盛的研究成果，帶起兩岸文學界更加密切的交流。兩岸的研究者，雖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成長，但透過溝通理解、互動砥礪，時時激盪出許多令人讚嘆的火花。

「大陸學者叢書」的構想，便是在這樣的感慨和讚嘆中形成的。從文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成果的交流 and 智慧的傳遞，是兩岸文學界最有意義的雙贏；於是我想，應從立足台

灣開始，將對岸學者的文學研究引介來台，這是現階段能夠做也應該做的努力。但是理想與現實之間，常存在著難以克服的主客觀因素，台灣出版界的不景氣，更提高了出版學術著作的困難度。

感謝秀威資訊公司的總經理宋政坤先生，他以顛覆傳統的數位印製模式，導入數位出版作業系統，作為這套叢書背後的堅實後盾，支持我的想法和做法，使「大陸學者叢書」能以學術價值作為出版考量，不受庫存壓力的影響，讓台灣讀者有更多機會接觸到彼岸的優質學術論著。在兩岸的學術交流上，還有很多的事要做，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相信，這套叢書的出版，會是一個美好開端。

宋如珊

2004年9月 於士林芝山岩

目次

總 序／宋如珊	i
第一章 緒論	1
一、翻譯的價值	3
二、翻譯的主體	17
三、翻譯的選擇	28
四、翻譯的方法	51
五、翻譯的效應	69
第二章 泰戈爾熱	73
一、泰戈爾熱的景象	73
二、泰戈爾熱的成因	83
三、泰戈爾熱的矛盾	103
第三章 日本文學翻譯	109
一、軌迹：從冷到熱	110
二、熱點：白樺派、廚川白村	124
三、眼力：著眼點與模糊點	149

第四章	易卜生熱.....	175
一、	譯介與演出.....	176
二、	認同與接受.....	190
三、	熱中之冷.....	203
第五章	兒童文學翻譯.....	217
一、	安徒生童話翻譯.....	218
二、	其他兒童文學翻譯.....	234
三、	兒童文學翻譯的特點.....	272
第六章	俄羅斯文學翻譯.....	287
一、	五四盛況及其原因.....	288
二、	回首「黃金時代」.....	299
三、	緊追「白銀時代」.....	325
後	記.....	363
參考書目		365

第一章

緒論

中國的翻譯文學，早在《左傳》、《國語》、《史記》、《說苑》、《漢書》、《後漢書》、《古今注》、《樂府詩集》等古典文獻中就留有零星的記載。東漢開始的佛經翻譯，包含了豐富的文學內容，諸如《法華經》、《維摩詰經》、《盂蘭盆經》、《華嚴經》等堪稱佛教文學的代表作。近代以來，隨著瞭解世界的需求逐漸增強，翻譯成為一項規模宏大的事業，繼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翻譯之後，翻譯文學蔚為大觀。

比起佛教文學來，近代翻譯文學已有自覺的文學意識，把外國文學作為文學來翻譯，但是，仍然存在著一些影響翻譯文學質量及其發展的問題，譬如：以「意譯」和譯述為主，其中根據譯者感情好惡、道德判斷及審美習慣而取捨、增添、發揮、誤譯、改譯、「中國化」（人名、地名、稱謂、典故等中國化，小說譯為章回體等）的現象相當嚴重；原著署名權沒有得到充分尊重，不少譯著不注明著者，或者有之但譯名混亂，還有一些譯著也不署譯者名¹；譯作中只有少

¹ 參照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33-43 頁。

數用白話翻譯，大多數與代表性成果則為文言；各種文體不平衡，小說居多，而詩歌、散文較少，話劇更是寥寥可數。

五四時期，由於新文化啟蒙運動的強力推動，新文學開創基業的急切需求，以及新聞出版業與新式教育的迅速發展，翻譯文學遠承古代翻譯的遺緒，近續近代翻譯的脈絡，呈現出波瀾壯闊的局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邁進了一個新紀元。譯者隊伍不斷擴大，發表陣地星羅棋布，讀者群遍布社會各個階層，翻譯文體漸趨豐富，白話翻譯升帳掛帥，翻譯批評相當活躍，翻譯質量有了長足進步，翻譯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學門類，堂而皇之地步入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殿堂。

在以往的現代文學史研究中，翻譯文學常常受到冷落，即使納入視野，也往往只是作為背景來看待。實際上，對於作家的養成、讀者審美趣味的熏陶、文學表現領域的開拓、文體範型與創作方法創作技巧的示範引導、現代文學語言的成熟，乃至整個現代文學的迅速萌生與茁壯成長，翻譯文學都起到了難以估量的巨大作用。翻譯文學不僅僅是新文學產生與發展的背景，而且從物件的選擇到翻譯的完成及成果的發表，從巨大的文學市場佔有量到對創作、批評與接受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都作為走上前臺的重要角色，直接參與了現代文學歷史的構建和民族審美心理風尚的發展，對此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

一、翻譯的價值

近代以來，中國經歷了側重於物質文明建設的洋務運動、旨在制度文明改革的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到了五四時期，以個性解放、思想革命為標誌的精神文明建設提到了社會發展的重要日程。在這一背景下，始於近代的對翻譯文學價值的認識，有了走向全面、深化的契機。

近代翻譯文學已經使國人初步見識到新穎的外國文學樣態及其所表現的異域風土人情，意識到文學也可以承載政治使命。新文化運動興起以後，儘管對新文學與翻譯文學都提出了啟蒙要求，但在一些人眼裏，新文學盡可承擔啟蒙的重任，而翻譯文學則只是為創造中國新文學所做的準備；文學創作是終極目標，而文學翻譯則不過是權宜之計。這實際上輕視了翻譯的價值。時在日本的郭沫若，正處於創作熱情高漲期，加之年輕人的敏感，因為自己的創作在報上發表時被排在翻譯的下面，便發出了「覺得國內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處子；只注重翻譯，而不注重產生」的感慨。他認為，「翻譯事業於我國青黃不接的現代頗有急切之必要……不過只能作為一種附屬的事業，總不宜使其凌越創造、研究之上，而狂振其暴威。」²十分看重翻譯的鄭振鐸，在題為《處女與媒婆》的短文中，對這種帶有一定傾向性的看法提出質疑，認為「他們都把翻譯的功用看差了。處女的應當尊重，是毫無疑義的。不過視翻譯的東西為媒婆，卻未免把翻

² 轉引自鄭振鐸《處女與媒婆》，1921年6月10日《時事新報·文學旬刊》第4號。

譯看得太輕了。翻譯的性質，固然有些像媒婆。但翻譯的大功用卻不在此。……就文學的本身看，一種文學作品產生了，介紹來了，不僅是文學的花園，又開了一朵花；乃是人類的最高精神，又多一個慰藉與交通的光明的道路了。如果在現在沒有世界通用的文字的時候，沒有翻譯的人，那麼除了原地方的人以外，這種作品的和融的光明，就不能照臨於別的地方了。所以翻譯一個文學作品，就如同創造了一個文學作品一樣；他們對於人們的最高精神上的作用是一樣的。」稍後，他又在《俄國文學史中的翻譯家》中指出：「翻譯家的功績的偉大決不下於創作家。他是人類的最高精神與情緒的交通者。」³在 1922 年 8 月 11 日《文學旬刊》上的《雜譚》中，他再一次說：「現在的介紹，最好是能有兩層的作用：（一）能改變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二）能引導中國人到現代的人生問題，與現代的思想相接觸。」

鄭振鐸一再強調翻譯文學對於精神建設的重要價值，這正體現出五四新文化啟蒙運動的時代特徵。這種見解並非鄭振鐸的個人看法，而是一班新文學先驅者的共識。沈雁冰在《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中明確指出：「介紹西洋文學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紹他們的文學藝術來，一半也為的是欲介紹世界的現代思想——而且這應是更注意些的目的。」他在主持《小說月報》全面革新一一年之際，回顧說：「我們一年來的努力較偏在於翻譯方面——就是介紹方面。時有讀者來信，說我們『蔑視創作』；他們重視創作的心理，我個

³ 1921 年 7 月《改造》雜誌。

人非常欽佩，然其對於文學作品功用的觀察，則亦不敢苟同。」要追尋永久的人性，溝通人間的心靈，提升人類的精神境界，並非一人乃至一國作家所能完成，在這個意義上，「翻譯文學作品和創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學』之邦像現在的我國，翻譯尤為重要；否則，將以何者療救靈魂的貧乏，修補人性的缺陷呢？」⁴在《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目的——兼答郭沫若君》⁵中，他再次強調：「翻譯家若果深惡自身所居的社會的腐敗，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國文學作品來抗議，來刺激將死的人心，也是極應該而有益的事。」魯迅翻譯武者小路實篤的《一個青年的夢》，就是想借此喚醒彼此隔膜、無端仇視的國民；翻譯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也並非想揭鄰人的缺失，來聊博國人的快意」，而是覺得「著者所指摘的微溫，中道，妥協，虛假，小氣，自大，保守等世態，簡直可以疑心是說著中國。尤其是凡事都做得不上不下，沒有底力；一切都要從靈向肉，度著幽魂生活這些話」。魯迅想借此讓「生在陳腐的古國的人們」意識到自身的腫痛，以便獲得割治腫痛的「痛快」，防止「倖存的古國，恃著固有而陳舊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終於要走到滅亡的路。」⁶五四時期的許多外國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夠進入譯者視野、通過翻譯而與廣大中國讀者見面，就是因為其中表現的個性主義、人道主義意蘊、民主、

⁴ 《一年來的感想與明年的計劃》，1921年12月10日《小說月報》第12卷第12號。

⁵ 1922年8月1日《時事新報·文學旬刊》第45號。

⁶ 魯迅《出了象牙之塔·後記》，北京未名社1925年12月版。

自由、平等、科學等現代觀念，正為新文化啟蒙運動所急需。這類翻譯作品在跨文化交流與現代啟蒙中也的確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1年8月12日《京報》「青年之友」裏有一篇文章說，「凡是翻譯的文學，只足供研究文學的人的研究資料而不能盡文學的真正任務——兒童文學尤其不是翻譯的文學所能充當」。當月20日，《時事新報·文學旬刊》第11號發表署名春的《兒童文學的翻譯問題》，對此質疑道：「翻譯不過是把文學作品的形式，變換一下，至於作品裏所表現的思想情感，經過一度翻譯之後，是決不會全然消失的；便是作品裏的情調，風格，韻律，要是譯得好，也往往能保存到八九分。那麼翻譯出來的東西，為什麼竟『不能盡文學的真正任務』呢？難道神曲的英文譯曲（本），深（浮）斯德的法文譯本，罪與罰的德文譯本，都只是『研究文學的人的研究資料』，不能算為一種文學作品嗎？」接著，作者以《一千零一夜》、安徒生童話、《魯濱遜漂流記》為例，說除了本民族能夠閱讀原本以外，全世界大多數兒童所讀的都是譯本，難道那些譯本都不能成立嗎？人類的思想感情有相通的地方，兒童尤其如此，兒童文學不應有國界的分別。中國的問題，不是翻譯過多了，而是嫌少，所以，他呼籲「為了我們的孩子，為了我們的文化前途」，應該多多翻譯西洋童話。文章雖然是從兒童文學切入，但觸及了對整個翻譯文學功能的認識。在新文學前驅者看來，翻譯文學可以作為創作的準備，也能夠充當認識外部世界的視窗與精神啟蒙的工具，但其功能決非僅僅如此而已；翻譯文學作為一種精神產品，具有超越地域和民族的人類普遍價值，作為一種文學作品，具有超越時空的審美魅力。

較之近代翻譯文學，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有了更多的文學自覺。沈雁冰把翻譯視之為當下最關係新文學前途盛衰的一件事⁷。關於翻譯之於創作的功用，鄭振鐸多次說過不僅僅為「媒婆」而止。他在《翻譯與創作》中將其比作哺乳的「奶娘」，還稱之為開窗「引進戶外的日光和清氣和一切美麗的景色」。總體來看，新文學前驅者認為從翻譯中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汲取營養滋補新文學。

一是文學觀念。傳統文學觀念中載道教化佔有重要地位，新文學前驅者意識到，要想完成文學觀念的現代轉型，將載道之「道」由家族主義、奴性主義等封建倫理置換成人道主義、個性主義等現代之「道」，改變視文學為高興時的遊戲與失意時的消遣的觀念，把文學看作一項表現人生、關乎人生的重要事業，並且真正把文學作為文學來看待，把握其基本特徵與發展規律，必須大力譯介外國文學理論。從古典的亞里士多德《詩學》到蘇俄新興文藝觀念，五四時期均有翻譯，而且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一點大大超越了近代文學翻譯。

二是文藝思潮。文藝思潮對於以往缺少文學史梳理的中國來說，本是一個陌生的概念，20 世紀之初引進中國，五四時期漸漸為國人所熟悉起來。此時，遠則文藝復興，近則寫實主義、象徵主義等思潮，紛紛譯介進來。從文藝復興體認外來影響對於文學發展的必要性與五四文學革命的合理性，從西方近代文藝思潮汲取新文學的發展資源。胡愈之在

⁷ 《譯文學書方法的討論》，《小說月報》第 12 卷第 4 號。

《近代文學上的寫實主義》⁸中指出：「翻譯文藝，和本國文藝思潮的發展，關係最大，俄國近代的文學家，可算盛極一時了，但他們的起源，實是受德國浪漫文學，法國寫實文學的影響。日本近年文藝思潮的勃興，也是翻譯西洋文學的功勞。所以翻譯西洋重要的文藝作品，是現在的一件要事。二三十年來我國翻譯西洋文學的成績，是不必說起，但從今以後，我國的一般文藝翻譯家，也該覺悟了。今後最要緊的，便是翻譯近代寫實主義的代表著作，因為新興的象徵主義神秘主義，和我國文藝思想，隔離尚遠，惟有寫實文學，可以救正從前形式文學，空想文學，『非人』的文學的弊病。所以像曹拉（今譯左拉——引者注）、莫泊三（今譯莫泊桑）、斯德林堡、哈提（今譯哈代）等的小說，易卜生、霍德曼（今譯霍普特曼）、皮龍生（今譯比昂遜）等的劇本，以及俄國名家的作品，都應該撿要緊的翻譯。翻譯的時候，須先懂得作者的身世派別，和他的特長，並且要用忠實細心的態度，不致埋沒原作的長處。要是這樣做去，真正的寫實文學，才會得輸入，我國文藝思潮的前途，才有一線的光明。」五四翻譯對文藝思潮的重視，尤其是對寫實主義情有獨鍾，於此可見一斑。但正如《〈小說月報〉的改革宣言》在肯定「寫實主義在今日尚有切實介紹之必要」的同時，主張「非寫實的文學亦應充其量輸入」⁹，實際上，五四時期譯介過來的文藝思潮相當豐富，舉凡西方近代以來的各種思潮都能看到，遠非寫實主義一種。

⁸ 1920年1月10日《東方雜誌》第17卷第1號。

⁹ 1921年1月10日《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

三是文體建設。新文學對於中國文學傳統無論情願不情願、自覺不自覺，都必然有所承傳，而對於外國文學卻是自覺地從語體到文體多有借鑒。這種借鑒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翻譯來實現的。五四文壇對此具有充分的自覺意識。胡適主張「趕緊多多的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¹⁰。曾樸贊同「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養我們創造的源泉」¹¹。鄭振鐸在《翻譯與創作》中說，「翻譯者在一國的文學史變化更急驟的時代，常是一個最需要的人。」《俄國文學史中的翻譯家》再次強調指出：「就文學的本身講，翻譯家的責任也是非常重要的。無論在那一國的文學史上，沒有不顯出受別國文學的影響的痕迹的。而負這種介紹的責任的，卻是翻譯家。」他舉出威克立夫的《聖經》譯本被稱為「英國散文之父」，路德的《聖經》譯文是德國近代文學的基礎，俄國文學史上翻譯事業對於俄語的形成乃至俄國文學發展的作用，來說明翻譯家對於本國文學建設是如何的重要。他在《俄國的詩歌》中，又拿幾個以翻譯著稱的詩人——翻譯賀拉斯全集的福依史、翻譯席勒的美依，翻譯席勒、歌德、莎士比亞、拜倫的格底爾，翻譯海涅的美克海洛夫，翻譯莎士比亞、拜倫、雪萊、歌德、海涅的文保爾為例，充分肯定「灌輸外國的文學入國中，使本國的文學，取材益宏，格式益精，其功正自不可沒」¹²。沈雁冰也說，「若再就文學技術的主點而言，我又覺得當今之時，翻譯的重要實不亞於創作。西

¹⁰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¹¹ 《病夫復胡適的信》，《真善美》1卷12號。

¹² 1922年2月1日《民鐸雜誌》第3卷第2期。

洋人研究文學技術所得的成績，我相信，我們都可以，或者一定要採用。採用別人的方法——技巧——和徒事仿效不同。我們用了別人的方法，加上自己的想像情緒……，結果可得自己的好的創作。在這意義上看來，翻譯就像是『手段』，由這手段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自己的新文學。」¹³

作為新文學語體的白話，一是從古代、近代的白話文學承傳而來，二是從生活中的日常言語汲取源泉，但如何使古代白話轉化為現代白話，將日常言語提煉成文學語言，則不能不歸功於翻譯文學。胡適、魯迅、周作人等新文學創作的前驅者，大抵也是現代翻譯文學的前驅者，他們在閱讀與翻譯外國文學的過程中仔細體味原作的語言韻味，摸索文學的白話表達方式，從而創造了白話語體。也就是說，現代文學的白話語體，不僅表現在創作之中，而且表現在翻譯之中，有時甚或首先成熟於翻譯之中。胡適的譯詩《老洛伯》、《關不住了》、《希望》等，堪稱《嘗試集》中最早成熟的作品與最出色的作品。周作人最初成熟的白話文作品也應該說是他翻譯的《童子 Lin 之奇迹》、《皇帝之公園》、《酋長》、《賣火柴的女兒》等。胡適在《新青年》第4卷第4號發表譯詩《老洛伯》時，加了一段較長的《引言》，指出「全篇作村婦口氣，語語率真，此當日之白話詩也」，強調蘇格蘭白話文學對於英國文學革新發展的重要意義。胡適翻譯此詩，一則緣於自身品嘗婚姻苦果與此詩達成共鳴，再則就是從中尋找文學革命的動力。《引言》便能看出譯者對翻譯文

¹³ 《一年來的感想與明年的計劃》。